

前言

本期共收錄三篇文章，分別討論了中國科技創新政策中的央地關係、歐盟與維謝格拉德集團（Visegrád Group，以下簡稱 V4 集團）的整合，以及近年台灣開放萊豬政策的分析。乍看之下，這三個議題毫不相關，但實際上，這三篇論文均討論到政治與經濟因素交互作用對國家行為者的影響。

在〈科技創新與央地關係：習近平時代的政策汲取、擴散與調適〉一文中，作者以「學習型威權主義」的概念討論中國的政策學習過程，汲取、擴散與調適。作者承認中國默許本地企業抄襲西方科技，甚至透過國家力量強制西方企業轉移技術，然而，中國同樣也會向外國借鑑合適經驗或制度，並以國家力量推廣或擴散。其中，央地關係是很重要的影響因素，因為各地政府面臨的狀況與中央法規未必一致，因而地方政府的實踐往往偏離中央法規，但中央政府也會依據地方的反饋意見調整或修補原先規範。而〈科技創新與央地關係〉一文也承認其觀察到的現象對 2018 年之前的解釋能力較強，因為 COVID-19 疫情爆發後，中國正逐漸走向「封閉型」的路徑，更強調「自主創新」，而非對外學習。

在〈依賴中的互賴關係：歐盟與維謝格拉德集團的整合〉一文中，作者從結構性依賴的角度討論歐盟 15 國東擴與 V4 集團「重返歐洲」的過程及結果。在 V4 集團回歸歐洲的過程中，V4 集團與前歐盟 15 國存在不平等結構，形成既依賴又互賴的關係，在經濟上 V4 集團高度依賴前歐盟 15 國，而在政治上，前歐盟 15 國則高度依賴 V4 集團，希望促使中東歐國家民主化及經濟發展並輸出「歐洲認同」。V4 集團即便仍處於傳統的結構性依賴關係中，但卻因加入歐盟而獲得進一步發展，可謂是一種「依賴式發展」。然而，在歐盟重視制度、規範與觀念的架構下，這樣的關係容易被凸顯與深化，V4

集團在政治上也自我節制了某些權力自主性，盡可能配合歐盟制度的要求。然而，「歐洲認同」的理念與價值觀卻在雙方獲取實質權力的過程中變得更脆弱。

在〈民進黨政府 (2016-2022) 開放萊豬政策之分析〉一文中，作者認為權力差距為導致民進黨政府開放萊豬進口的原因，但期間存在「民進黨政府對萊豬議題的認知變化」此一中介變數，而萊豬議題的爭議程度則是調節變數，爭議程度越冷清，越有利於開放萊豬進口。2016 年後，中國日益提升其對台灣侵略性的同時，兩岸權力差距也不斷增加，致使台灣透過開放萊豬進口增進台美關係，並降低兩岸之間的權力差距，而在這個過程中，執政黨政府對開放萊豬的認知從單純的經濟思維轉向國家安全思維，並大力宣傳開放政策符合 CODEX 標準以降低社會爭議，進而得以成功推動萊豬進口政策。

這三篇文章中，〈科技創新與央地關係〉討論到引進或創造新制度之際，中央政府如何依照眾多地方政府的困難與建議重新調整政策；〈依賴中的互賴關係〉討論不同背景的國家如何整合，雙方如何在政治認同與經濟發展各取所需；〈民進黨政府 (2016-2022) 開放萊豬政策之分析〉一文則討論國際壓力如何促使執政者以國家安全與經濟利益再定義爭議政策。這三篇文章不難看出國際壓力與第一線的執行者對政策的可行性評估，可能促使政府改變政策。即便政策過程的參與者之間能取得「各取所需」的平衡，但當議題的敏感性與政治性越高，維持平衡的難度也越高。

《遠景基金會季刊》編輯部